

## “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 1890 年 3 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5 月,他曾积极投身于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支援中国抗战,1938 年 1 月,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奔赴中国,于 3 月底辗转到达延安。

毛泽东专门接见了白求恩,据白求恩的随行护士琼·尤恩回忆,毛泽东和白求恩握手之后,“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似的拥抱”。当白求恩把加拿大共产党员的证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郑重地说道:“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交谈中,白求恩被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毛泽东的人格深深打动。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感染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位于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柯棣华的白色墓碑静静地躺在翠柏丛中。每个祭扫的日子,都会有人来悼念,在墓碑前献上一束束鲜花。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帮助过他们的外国朋友。”印度西孟加拉邦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甘泰特访华后感慨地说。

1938 年,柯棣华等 5 名医生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到中国,“代表印度人民对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表示支持。”甘泰特介绍说。

像柯棣华一样,其他的印度医生也有一个以“华”字结尾的中文名字: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

甘泰特在中国了解到很多关于柯棣华的故事,“他包扎伤口时动作轻捷,极少见伤员在他换药时说疼痛。行军路上,他把马让给伤员骑;风雨途中,他把草帽摘下来盖在伤员身上……”

柯棣华曾经在 1940 年一场战役时连续工作三天三夜,在 13 天的战斗中,他指挥救助了 800 余名伤病员。

1941 年 1 月,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工作更加夜以继

日,“即使听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柯棣华也没有返回印度。”甘泰特说,“相反,他重申了继续在中国工作的承诺。这种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精神堪称典范。”

伤病员和群众都无比敬爱柯棣华,亲热地称他为“老柯”“贴心大夫”。

在中国期间,柯棣华努力学习汉语,可以用汉语授课,给中国培养更多的医疗专业人员。

没有适用的教材,柯棣华就自己编写。1942 年 12 月 8 日深夜,柯棣华用钢笔在他编写的第二本教学讲义《外科各论》上刚写下新一页的编号 173,突然全身一阵剧烈抽搐,他的笔在纸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横线——他倒下了,由于癫痫去世,32 岁的人生定格在中国河北省唐县一个叫葛公村的地方。

柯棣华去世后,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词称:“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柯棣华大夫曾经在白求恩墓旁宣誓,‘我要像你那样生活,他做到了,他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了生命。’甘泰特说。

(据新华社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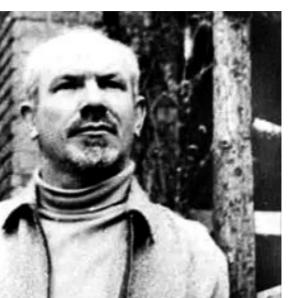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进行了认真学习,并在思想深处表示认同。因深受毛泽东《论持久战》影响,他在致友人信中多次强调:“我们要持久战,而且在日军被赶出中国之前决不言和”“日本决不可能征服中国”。

1938 年 6 月,白求恩带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抗日前线,白求恩夜以继日地工作,救治了大批伤员。

通过与当地军民的接触,白求恩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十分强大”,是“抗日运动、土改运动及工会的领导者”。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唯一有可能将中国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

更让白求恩敬佩不已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他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品格深深打动,认为“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满仇恨,无私、坚决、爱憎分明”。这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他曾致信友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理应得到帮助。我还要待在这里。”他还说道:“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9 年 11 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仍然表示:“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在中国期间,白求恩与中



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他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品格深深打动,认为“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满仇恨,无私、坚决、爱憎分明”。这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他曾致信友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理应得到帮助。我还要待在这里。”他还说道:“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9 年 11 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仍然表示:“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摘自《学习时报》)

1915 年,汉斯·米勒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犹太家庭,自幼便对种族歧视有着切肤之痛。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横行,米勒争取到瑞士签证,进入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深造。

1939 年 1 月,米勒拿到内科博士学位后凑齐了路费,投身中国抗战。

1939 年 7 月,经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介绍,米勒抵达延安。同年 11 月,他主动请缨投身抗战第一线,经毛泽东推荐,奔赴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医院。之后,他辗转于 129 师、385 旅、386 旅等一线作战部队,成为战士最坚实、最可靠的后盾。

1940 年,百团大战爆发。战斗最激烈时,一天有百余名单兵送往医疗队。时任 129 师流动手术队队长的米勒因身材高大,常常要跪在简陋的、用门板搭建的手术台边,为伤员们取子弹、处理伤口。“有时候没有麻药,战士们疼得直哆嗦,父亲只能咬牙快点做,生怕耽误治疗,引发感染。”米勒的儿子米德华后来告诉记者,一次,日军扫荡根据地,侦察员报告日军距医院仅 4 公里,米勒迅速组织 20 名医护转移

200 多名伤病员。当他和战友们用门板将最后一名重伤员抬到山上安全区时,日军的刺刀已在山脚下闪烁寒光。

米德华还讲述了另一段故事。战时,宋庆龄组织国外华侨为延安捐赠了一台宝贵的 X 光机。当机器运抵延安时,众人都愣住了。原来,美国“飞虎队”队员为了便于运输,将机器拆成了零件。米勒当仁不让接下任务,组装复原 X 光机,为后来的伤员拍下珍贵的 X 光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米勒曾计划从东北经苏联,再返回德国探亲。但刚到东北,解放战争便爆发了,他当即决定留下来继续战斗。从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长,到第四野战军医管局主任……整个战争时期,米勒亲手救治的将士超 9000 人。

1951 年,米勒加入中国国籍,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在中国继续贡献智慧与力量,特别是为中国乙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制立下功勋,被誉为新中国的“乙肝疫苗之父”。1989 年,他被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1994 年,米勒在北京逝世,享年 79 岁。

(摘自《生命时报》)

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

## 自我创造

我们本地有个徒步群,群成员每周六早晨徒步十来英里(1 英里约为 1.6 千米)。约翰,年过七十,出生在蒙大拿州的一个农庄。他高中毕业想加入空军,当时正值越战,空军的名额有限制,蒙大拿州的名额已经报满了。他不想放弃,兵站的人告诉他,得克萨斯州人口多,名额也多,听说还没有报满。

一个 17 岁的孩子,没出过远门,带着 25 美元就上路了,一路搭便车,走到哪儿算哪儿,天黑了就找地方歇一夜。他在 1000 多英里外终于报上了名。空军教给他修飞机的技术,退役后,他做机械师,一生都很顺利。他说,从军队学到的最重要的还不是技术,而是对人的理解。

约翰曾被派驻亚洲的一个军用机场。他结交了当地的军官、士兵和他们的家属、

朋友,还有当地居民。这段经历让他变得更宽容、更谦逊,更愿意去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约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失业的人,把家当装在汽车上去找工作。路过一个加油站,他问老板需不需要人手。老板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他说他讨厌家乡的人,他们对他不好,他不想在家乡待了。老板说,其实我们这里的人跟你家乡的人是一样的。

过了几天,另一个失业的异乡人路过加油站,问老板能不能给他一份工作。老板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人说,原来的老板对他不错,但无奈经济不好,工厂关门了,家乡人虽然很好,但工作机会太少,

他便出来碰碰运气。老板说,我们这里正好缺人手,就把他留了下来。

约翰说,年轻时这个故事对他启发挺大,就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别人,不要有受害者心态。没人喜欢消极的人,没人喜欢有受害者心态的人。他批评现在太多美国人有受害者心态——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政客迎合这种有受害者心态的选民,却对解决问题不感兴趣。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千万、亿万富翁,像约翰这样从逆境中奋斗出来的,就是自我创造的人。

另一位是土耳其移民奥赞·瓦罗尔。虽家境贫寒,但他特别用功,17 岁高中毕业,到康奈尔大学读本科。在康奈尔,他参与了火星探索计划,毕业后成了一名火箭科学家。后来,他喜欢法律,又去念法学,在美国做律师,成了宪法学教授。有了终身教职,他却对教书失去兴趣,辞掉了法学教授的工作,开始写博客,做视频,写了两本畅销书,

其中《唤醒你的天才》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畅销书榜单。

奥赞接受采访时,讲了他从土耳其来到美国,从科学家到法学教授、作家、主播的心路历程。他说,人们对世界都有好奇心,但人生每迈出一步,都要战胜对未来和不确定性的恐惧。关键是,怎么看待成功和失败。

事业失败与人生失败,哪一个是更惨的失败?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人生总会充满遗憾,最大的遗憾,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今年新年过后,奥赞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篇短文。他引用作家多克托罗的话:“写一本书,就像在黑夜开车一样,你只能看到车灯照的前方,但一直开下去,便会到达目的地。”奥赞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人生箴言之一。

那些自我创造的人,不是看清楚未来的人轨迹才上路,而是克服了对未知的恐惧,边走边探索。因为看不清楚,就不愿行动,只能一生原地踏步。

(摘自《财新周刊》刘宗坤/文)



《焦虑的一代》  
乔纳森·海纳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孩子需要和伙伴们一起面对面地玩耍,以提高社交能力。但“几乎每天”都能和朋友一起玩的学生的比例,自 2009 年起呈显著下降趋势。Z 世代早在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时,就已经开始主动隔离自己,在保持社交距离方面表现“优异”。

青少年是不会察觉到自己在远离朋友的。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把友谊的舞台从现实世界搬到了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而已。那不是挺好的吗?其实那并不好。正如心理学家琼·特文吉所展示的,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越多,越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或其他障碍;参加同龄人的集体活动越多,比如团体性的体育运动,孩子的心理就越健康。

2014 年,《高光》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 6 至 12 岁的儿童中,有 62% 的孩子表示,每当自己想跟父母交谈时,父母总是心不在焉,最大的原因就是看手机。父母也知道自己对不起孩子。2020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8% 的父母承认,他们在陪伴孩子时,偶尔或常常会因为手

机分心。在年轻的父母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

童年大重构改变了 Z 世代的社交生活,因为智能手机可以把 Z 世代的孩子与全世界的人都连接起来,却唯独隔绝了身边的人。一位加拿大的大学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Z 世代是孤独的一代。我们的友谊很虚浮,我们的爱情很脆弱。这些关系深受社交媒体的引导和牵制……你不能发现,大学校园里早没了社群的概念。当我走进上课的教室时,常常看到 30 多个学生一言不发地待着。教室里静悄悄,每个人都刷着手机。没人敢发出声音,好像生怕被别人听到。环境越安静,我们就越疏离,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的建立更是无从谈起。我对这种体验再熟悉不过,因为我是其中的亲历者。